

PHILIPP FREIHERR VON BOESELAGER

NOUS
VOULIONS
LE DERNIER SURVIVANT TUER
DU COMPLÔT DU 20 JUILLET 1944 HITLER
刺杀希特勒

1944年7月20日刺杀行动的最后见证人

作家出版社 【德】菲利普·弗赖海尔·冯·勃泽拉格 著 袁粮钢 译



NOUS
VOULIONS
TUER HITLER

LE DERNIER SURVIVANT
DU COMPLÔT DU 20 JUILLET 1944

PHILIPP FREIHERR VON BOESELAGER

刺杀希特勒

1944年7月20日
刺杀行动的最后见证人

(德) 菲利普·弗赖海尔·冯·勃泽拉格 著
袁粮钢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2010-57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刺杀希特勒: 1944年7月20日刺杀行动的最后见证人 / (德) 勃泽拉格著;
袁粮钢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063-6156-9

I. ①刺… II. ①勃… ②袁… III. ①纪实文学—德国—现代 IV. ①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31864号

Philippe Freiherr von Boeselager
Nous voulions tuer Hitler
© Editions Perrin, 2008



策划: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刺杀希特勒

作者: (德) 菲利普·弗赖海尔·冯·勃泽拉格

译者: 袁粮钢

责任编辑: 王忻 翟婧婧 周茹

封面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205

字数: 90千

印张: 5.75 插页: 8

版次: 2011年 11月第 1 版

印次: 2011年 11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156-9

定价: 20.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特瑞斯可夫集团的同志
们，他们将自己的一生铸就一句格言：

纵然人皆是之，吾独非之！

前　　言

菲利普·冯·勃泽拉格是一位不多见的人。无论是他的经验还是履历，都能给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一个证明，这便是本书行将揭示的东西。

如果不是在战场上受伤留下后遗症，没什么能让人看出这位看似内心平静的老人曾经历过二战无休无止的噩梦，更无法揣摩他曾体验过的持续的内心紧张，因为他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参与密谋，就是在谋划一项罪行。在其他德国人看来，这就是背叛自己的祖国，加速它的最后灭亡。说到底，对任何受过骑士教育的人来说，这都意味着过一种双重身份的生活和进行棘手的操练。

回忆菲利普·冯·勃泽拉格，闭口不谈格奥尔格或许是一种荒唐行为。无论是在孩提游戏时还是在战争的艰难岁月中，他们都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兄弟，他们一起守护着那次行动的秘密。毫无疑问，作者是想通过一起在历史长

河中并非举足轻重的事件，来阐述一种责任感，一种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点将在后记中加以叙述。

菲利普·冯·勃泽拉格愿就这个时期进行长时间交谈，交谈内容便是本书的素材。实际上，他并不太愿意谈论这个时期，每次回忆都会唤醒他近似残酷的记忆以及痛苦。他参与针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一直是个秘密，此前他一直守口如瓶，即便是在战争结束后。他当时甚至未向太太透露。然而，他是最后一名仍在世的阴谋参与者。他并不太相信偶然，他知道，如果说他能够死里逃生，同样是要向世人证明什么。

弗洛朗斯和热罗姆·菲伦巴赫

2007年8月16日于圣沙弗雷

目 录

前 言	1
自由的味道	1
抉择之时（1933 年 ~1936 年）	7
逼真的战争（1939 年 ~1940 年）	19
为胜利冲锋（1940 年 6 月 9 日）	21
承 诺（1940 年 6 月 17 日）	25
闪电战（1941 年 6 月 ~1941 年 11 月）	29
地狱里的圣诞节（1941 年 12 月 ~1942 年 1 月）	39
密谋征兆（1941 年 ~1942 年）	51
与恶魔相遇（1942 年 6 月）	61
希特勒司令部的一起事件（1942 年 7 月）	71
有毒的礼物（1942 年 10 月）	75
特瑞斯可夫集团（1942 年 ~1944 年）	81

战马为战斗加油（1943 年）	91
1943 年 3 月的三次失败	99
逮捕野蛮者	107
暴风骤雨中的骑兵	110
手提箱炸弹	123
强制休息	126
处境危险的骑兵团（1944 年 7 月）	130
悲痛时刻	143
莫拉大桥（1945 年）	153
结束语	160
后记	162
资料来源	165

自由的味道

格奥尔格生于1915年8月，我则生于1917年9月，我们分别在家中排行老四和老五，家里共有九个孩子。

1910年，我们家放弃了波恩的豪宅，搬到了海默斯海姆（在雷纳尼）。波恩的那栋豪宅是18世纪巴伐利亚州克莱芒-奥古斯特大主教的豪宅¹之一。那里有水渠，壕沟四通八达，中央白色建筑物上歇满了鸽子，两侧是尖塔，豪宅建在一个小岛上，必须通过一连串小桥才能上岛，如同中国的颐和园一样。这里有一个大型公园，处于半野生状态，狍子在这里来去自由，守护着家族的秘密，享受着巢穴外的大自然。在我们看来，海默斯海姆就像神话里的城堡。没有什么比在这个秘密世界里过一种封闭式的生活更容易。孩子在这里能够充分发挥想象力，尽情玩耍，很难

¹ 那栋豪宅于1923年卖给了市政当局。

找到比这儿更能放飞心灵的地方。

我们在海默斯海姆接受的是自由式教育，对路过的客人来说，我们的豪宅总是令他们感到吃惊（我们接待过很多过路客），母亲认为，我们有幸住进一处豪宅，应该懂得慷慨待人，但她对我们的教育却并非同样宽容。我们的生活必须遵守几条牢不可破的固定道德标准：例如，禁止虐待动物。在这一架构中，我们有很大的操作余地。

父亲名叫阿尔贝特·冯·勃泽拉格，是一个风雅的人，也是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奶奶出生在布鲁塞尔，父亲因此将欧洲贵族视为一个整体。他打猎的足迹遍布整个欧洲大陆，他能讲四五种语言。

有鉴于此，他特别重视学习充分利用自由（对他来说，从中学到基督教的辨别能力是必然结果）和打猎。格奥尔格刚 13 岁就收到了一件作为礼物的猎枪，那是在 1928 年圣诞节。15 岁时，哥哥已有了约 150 件打猎成果。他十分喜欢打猎，已到了把一支枪拆散带进寄宿学校的地步，当然是在我的帮助下（我公开承认）。当学监斯特拉瑟查房并检查学生行李时，我们必须再次运用双簧计（兄弟合谋掩饰此事）。整个检查期间，我们分别将枪的一部分藏在短裤内（格奥尔格藏枪筒，我藏枪柄）。我们像是在玩杂技，因

为他的手不能放在口袋里，所以必须防止枪筒掉出来。

打猎确实使我们在大自然中得到了锻炼。它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尤其是格奥尔格，学会了在太阳还未升起时，在森林中识别自己所处的位置，学会了朝大松鸡匍匐爬行几米而不被察觉，学会了钻进荆棘丛而不发出任何声响，以免惊跑狍子，学会了不留痕迹地将自己伪装起来，消失在草丛中，学会了忍受潜伏时的寂寞并呆在那儿一动不动，学会了在最佳时机出手。总之，无论是集体打猎还是单独长时间外出打猎，对动物的喜爱，让这位大自然的真正钟情者充满朝气，也使格奥尔格成为一名真正的印第安人。他将一直保持这种状态。这种锻炼后来对他显得十分珍贵。

打猎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还能在不知不觉中帮我们认识生活规则和生存竞争；同时，还学会了节省体力，规避对手，了解风险。使我们能够在狗因被激怒而发出的狂吠声中保持镇定。朝鹿或野猪颈部给予致命一击，目睹它们因致命伤而涌出紫色呕吐物时毫无惧色；看到褐色捕猎网钩住一只年幼狍子的毛皮，或看到动物被追得精疲力竭口吐血色泡沫时而不颤栗，承受死亡动物的无神目光，最后将这些血淋淋且湿漉漉的战利品带走。这同样是在让

自己逐步习惯于剧烈死亡的规律，使祭献的概念潜移默化地进入我们的脑海中。不错，打猎是为最高牺牲即献生做准备。

我们是在哥德斯堡受的教育，没有偏离人们在海默斯海姆授课的轨道，我通常将其形容为“轻松的天主教”。我们家庭信奉天主教。在过去好几个世纪里，家族的历史与德国天主教主教的历史紧密相连。我们的先祖海登－贝尔德布施在18世纪是科隆最有权势主教的牧师，海默斯海姆的城堡就是他们传给我们的。我们的祖宗萨策恩霍芬在同一时期效力于德国美因兹的选举主教，我们继承了他在克罗伊茨堡的财产。

格奥尔格和我是在一起滚爬中度过童年的。我们只相差两岁，成了像卡斯达星和波利克斯星一样的天然玩伴和同类闹剧的合谋者。然而，这种亲密无间把我们变成了手足情外的一个细胞，却未妨碍我们的个性发展，也未削弱哥哥对弟弟的自然影响。我们的二重唱是建立在互补基础上的。格奥尔格体魄更强壮、更健硕、更凭直觉行事，具有对人、对景、对事的本能感知。我则相反，天生更审慎，遇事更爱分析。我认为，童年时代的两件小事就很能反映出我们性格的差异。

海默斯海姆公园生活着很多自由自在的狍子，这些动物有时会走近房屋。一天，比我大不到 10 岁的哥哥安东尼斯和赫尔曼挑逗起其中一只狍子，以向它们扔石子为乐。格奥尔格坐在一个隐蔽的石凳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切。突然，一只狍子接受了鲁莽的孩子们的挑战，发起了攻击。格奥尔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作出反应。虽然他只有 5 岁，却立即拿起安东尼斯放在凳子旁的卡宾枪，朝动物瞄准并开枪。啪嗒！格奥尔格无法承受开枪产生的后坐力，仰面倒地，被枪托猛击了一下。所幸的是，这一击并没有让他流血。但是，巨大的响声足以吓跑狍子；当时我虽然还不到 4 岁，同样在一次家庭午餐上出了名，事情是这样的：施托尔贝格表兄在一战中头部严重受伤，外科医生在其头颅上装了块银板，以补上被敌人子弹留下的伤口。他虽然受伤，却活了很久，直到 1960 年才离世。我听说了这个离奇的手术，想亲自验证一下事实。我不声不响地爬到一张椅子上，朝表兄的头部弯过身，对闪着贵金属光亮的秃发处进行了一次谨慎而深入的检查。于是，我神情沮丧，大声喊了起来：“可这不是银币啊！上面没有印记！”四记耳光算是对我这一中肯感慨的回报……

坦率地说，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从来都是

不闻不问。当时，主要是由老师上门授课，这种教育模式已经好多年了，然而孩子们需要接受现代教育。“学校嘛，”父亲叹着气对我们说，“在我们这个年代已成为一种必要。这种事很烦心，可也必须去那里！”于是，我们被送进了哥德斯堡的阿洛伊西乌斯耶稣会学校，这所学校就在波恩近郊。老实说，上寄宿学校几乎未让我们黯然神伤。当时，海默斯海姆离学校还不足一小时车程。阿洛伊西乌斯耶稣会学校的教育目标不是培养神甫，而是要调和好人身上的圣事与俗事，让他们能够在世事混乱中保持信仰的光芒永照。宗教实践不应是自我终结，而是在生活中，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年轻人的生命中，学会利用时光。在哥德斯堡度过的五年或六年时光，有助于一种坚实的、真实的、简单的、适度的信仰在我们身上生根。

寄宿学校校长是一位爱国人士。很久以来，耶稣会教育一直以宣扬基督教价值、人道主义、荣誉感、尊重他人、知识严谨的传统和在关键时刻保持警觉的传统为特征，在他看来，只要热爱祖国，这些特征并非不可并存。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我们同学中，没有一个人后来成为纳粹斗士。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比较例外的，因此，这一事实有必要强调一下。

抉择之时(1933 年 ~ 1936 年)

1933 年，纳粹上台执政时，格奥尔格还不到 18 岁，我刚满 15 岁。可以说，这件事后来对我们及我们的家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我们当时对它漠不关心。父母远不赞同这个党的意识形态，所以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终结多少有点留恋。

我们知道失败的屈辱是什么滋味。从 1919 年到 1926 年，作为被盟军占领下的莱茵河左岸的居民，我们目睹了加拿大人、英国人，接着是法国人的践踏（主要是通过殖民军体现）。在和平时代被占领的六年是漫长而难以忍受的。对我们德国人来说，这种局面无法理解：德国西部没有被击破，战争期间没有受到任何侵略，这便是和平，一种被视为不公正的和平，建立这种和平就是要毁掉我们的国家，招致外来占领。即使是安稳的，被占时期也不会加强人民间的友谊。鲁尔地区在 1923 年至 1926 年被占领期

间，伴随而来的是暴力和欺压，立即枪决达到 121 宗，遭驱逐的有几万人，造成全国总罢工（在总理库诺的指使下）和德国工业重地经济崩溃，引起可怕的通货膨胀。我认为，这一切加剧了莱茵河沿岸居民对法国人固有的成见。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被认为是一个讨厌的邻居。虽然我还是个孩子，但被占领的耻辱也没能逃过我的眼睛。我还记得，父母曾收到禁止参加奶奶葬礼的禁令，理由是父亲是预备役军官。我同样记得，学校热情欢迎泽伦老爹的仪式，当他看到法国军队时，竟然唱起了德国国歌，这在左岸地区是严厉禁止的。所幸的是，这位耶稣会会士是荷兰籍人士，法国人不能逮捕他。因此，年轻时，我们也在进行着某种力所能及的抵制。

父亲是一个未定型的欧洲人，天生不太喜欢复仇。然而，作为一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军官，他又是一名爱国者，因此拥护恢复德意志伟大民族的所有权利。他曾将自己的这一愿望灌输给我们，却没有强加给我们。因此，哥哥安东尼斯加入钢盔党是件很自然的事。

或许法国读者会对那一时期德国爱国者的政治立场产生某种怀疑，甚至希望从中看到对希特勒野心表现出的无法接受的妥协，这一点我或许还是能够理解的，我们毕竟

能分清是非。与法国人在 1914 年不知天高地厚地奢求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其怀抱相比，我们并不感到寻求德国复兴更有罪。

我必须讲述一件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它使我了解到希特勒手下的行为方式。1934 年，希特勒来到波恩。出于好奇，我在学校一名同学的陪伴下，偷偷溜出了校园。我们朝希特勒即将下榻的德瑞森酒店走去并在附近埋伏起来，这样的话，至少可以在台阶上看到他。我们的小伎俩被人发现了。两名党卫军迅速逮住我们，毫不客气地将我们关进一个车库并把门牢牢锁上。当时，我们十分担心校长知道这一情况后处罚我们。我们一直被关到凌晨，既没吃东西，也没睡觉。直到总理走后，我们才被放出来。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开小差的事并没有在学校被拆穿。我更想说的是，在这一天和当天晚上，我们有理由进行一些思考。

我得说，关于 1934 年的危机及其后果，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们并不太了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老师也不能对我们谈论政治。但我们能够感觉到，老师们对克劳斯纳博士惨遭杀害义愤填膺，他仅仅因为冒犯了纳粹冲锋队而招惹杀身之祸。纳粹运动令人生疑的性质不久便通过另一种方